

●文 学

陶渊明“六经”观及其文风建构

孙 宝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 要: 陶渊明遍综群经,别铸自我新知,形成鲜明的“六经观”,主要包括儒家仁孝伦理观、周易天命观和刚健人格观等内容,它们又对陶渊明的文风建构产生深刻影响。在晋宋之交玄风渐衰之际,陶渊明以清新质朴、开心见性的方式表达了对儒学价值观念的皈依和传扬,既是元嘉文坛儒化文风趋盛的先声,又开启了南朝士人儒家进取价值观与闲适生活态度碰撞、融通的文学主题。

关键词: 陶渊明; 六经; 儒家天命观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14)05-0033-06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 Yuanming's Views of Confucian Six Class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Literary Style

SUN B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was affected profoundly by Confucian classics and formed his own Confucian views. To sum up, they were Confucianist's kind-hearted and filial ethics, views of mandate of heaven and upright personality, which greatly influe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literary style. At the time of change of Jin and Song Dynasties and metaphysical trend falling to decline, Tao Yuanming expressed his submission to Confucianism values in a pure, simple and joyful way, which was a harbinger of the prevalence of Confucian style of writing in the period of Yuanjia. He also set a new literary theme which revealed the shock and convergence of Confucian scholars' enterprising values and leisurely and comfortable life attitude in the South Dynasty.

Key words: Tao Yuanming; Confucian Six Classics; Confucian views of mandate of heaven

陶渊明的思想构成较为复杂,儒家经义却是其思想的根底。其《感士不遇赋序》有“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之句,所谓“讲习”,出自《周易·兑卦》象辞“君子以朋友讲习”,这说明他有一定的讲学研习的活动;就序中对“善行”“笃素”“真风”“廉退”“怀正志道”“洁己清操”等品节的推重,^{[1]255}不难看出陶渊明的“讲习”活动以儒家道义信条为依

归。这在其诗歌中也有大量体现。如《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1]161}《答庞参军诗》“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1]77}《荣木》“先师遗训,余岂云坠”,^{[1]10}等等。据杨勇《陶渊明集校笺》、龚斌《陶渊明集校笺》、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进行统计,^①陶渊明征引儒典涉及《诗经》《论语》《礼记》《仪礼》《大戴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穀梁

收稿日期: 2014-07-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1FZW027); 教育部人文社科西部边疆青年项目(10XJC751005); 第五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1M500716)

作者简介: 孙宝(1980-),男,山东淄博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文献学博士后,主攻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经学史研究。

传》《尚书》《孟子》《孝经》等。宗奉儒典促生了陶渊明的“六经”观,大致包含儒家仁孝伦理观、居易天命观和刚健人格观等内容,它们又对陶渊明的平和清雅、耿健刚直兼具的文风建构产生深刻影响。

一、《孝经》《左传》与陶渊明仁孝人伦观

虽然陶渊明诗文中征引《孝经》的次数不多,仅《命子》“三千之罪,无后为急”句,^{[1]31}出自《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但仁孝思想却是其仁孝人伦观的核心。陶渊明曾作《五孝传》分别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中孝义可称者加以表彰。清人陈澧评价说“陶渊明有《五孝传》,或疑后人依托,澧谓不必疑也。盖陶公于家庭乡里以《孝经》为教,称引故实以证之。故其《庶人孝传赞》云‘嗟尔众庶,鉴兹前式。’^{[2]6}上述说明陶渊明以《五孝传》作为家学读本用途。陶渊明认为孝是人伦教化的基础,所谓“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1]321}他还认为,孝是德操之首,即“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或“至德要道,莫大于孝”。^{[1]314}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仁惟本悌,圣亦基孝”的观念,^{[1]318}强调孝是凡圣共同践行的道德标准。就《五孝传》来看,陶渊明的仁孝观并非仅立足《孝经》,而是源自他对儒家经典孝义精神的全面理解。如他引《尚书·益稷》之语,赞誉尧“爱敬尽于事亲”;引《论语·泰伯》孔子之语,赞誉禹敬奉宗庙之举;引《尚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赞誉殷高宗推行孝德教化;合引《礼记·文王世子》与《诗经·大雅·思齐》,赞誉周文王的孝亲之举;引《诗经·大雅·生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赞誉颖考叔纯孝。^{[1]313-314}可见,他善于从六艺经典中抽绎崇孝的言辞,以之作为《孝经》的补充;又善于从诸子、史籍中精检孝亲的言行,以之作为儒家经典的副翼。

尊孔崇贤是陶渊明仁孝思想的根本所在。他《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以及《饮酒》其二十“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等语,^{[1]122,166}均表达了对孔子的宗奉。明人安磐则依据上述内容径称“予谓汉魏以来,知遵孔子而有志圣贤之学者,渊明也。”^{[3]816-817}陶渊明强调兄弟友于、家庭和睦的人伦思想对其创作有直接影响。陶渊明《与子俨等书》就告诫诸子“汝等虽不同生,

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1]302}其《祭程氏妹文》表达“谁无兄弟,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的恻惋;^{[1]305}《祭从弟敬远文》揭示与陶敬远“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齟齬,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的亲情厚谊。^{[1]308}其他如《杂诗》《归去来辞》《归园田居》其四、《咏贫士》其七、《止酒》《酬刘柴桑》《和郭主簿》其一、《悲从弟仲德》等,也是注重人伦情感的最直接的说明。对此,清人邱嘉穗评价说“余读‘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及‘久游恋所生’,与夫《悲从弟》《祭程氏妹》诸诗文,而知公之真孝友;读《责子》《告俨》等疏,及‘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等句,而知公之真慈爱。”^{[4]243Lb-下a}

与《孝经》不同,陶集征引《左传》大多限于化用语词、句式、典事等修辞层面。不过,从思想角度来看,《左传》择邻敬友的观念却对陶渊明有较深影响。《饮酒》其十四“班荆坐松下”,《与子俨等疏》“归生、伍举,班荆道旧”等句,^{[1]159,302}援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班荆道故”之典,展示对友谊的看重。《移居》其一说“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1]86}则是《左传·昭公三年》“非宅是卜,惟邻是卜”的体现。这些均是陶渊明甘于乡隐、择邻而居的精神基础。他信奉《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观念,能基于对劳动的尊重而开展与农夫无等级隔阂的交流。《归田园居》其二“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想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其五“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1]59,62}均体现出他跨越士庶之别而重德不重位的交往原则。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说“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1]256}所谓“原百行之攸贵”,即是孝。他秉承《孝经》《左传》中“忠孝”“信义”的仁孝观念,以“孝”“善”“诚”作为生活日用中立身行事的根本原则。正因如此,宋人惠洪评价陶渊明《归去来辞》说“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吾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5]2436}惠洪之论正可见《孝经》《左传》两书对陶渊明真淳诚挚文风的化育作用。

二、《论语》《礼记》《周易》与陶渊明居易天命观

沈德源曾说“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縟者征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6]203-204}此论不尽稳妥,却也揭示出陶渊明对《论语》的倚重。陶渊明好《论语》,有家学影响的成分。如陶渊明外祖孟嘉为当世名士,其弟孟陋“博学多通,长于《三礼》。注《论语》,行于世”。^{[7]2443}陶渊明也颇受《礼记》的浸染,其《答庞参军序》“辄依周礼往复之义”,即以《礼记·曲礼》“礼尚往来”为据。义熙末,周续之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应檀韶之邀共在江州城北讲说、雘校《礼记》。陶渊明作《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赞许三人在靠近“马队”的公廨中讲《礼》校书,^{[1]68}并认为是兴复斯文、承续仁道之举。陶渊明对《礼记》除了借词以寄意的简单化用外,还注重化句以造境。他喜以《月令》为蓝本,深化对四季时令的描写。如《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蕤宾五月中”、《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叩枻新秋月……凉风起将夕”、《九日闲居》“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自祭文》“岁惟丁未,律中无射”等句,^{[1]107,118,54,310}基本是对《月令》“仲夏之月”“孟秋之月”“季秋之月”相关描写的直接袭用。有些则对诗文深层意蕴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杂诗》其十“沉阴拟薰麝”句,^{[1]212}出自《月令》(季春之月)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对时局动荡有暗示作用。继而,这也成为此诗下句“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等心有余悸而不明宣的缘由。^{[1]212}另外,《劝农》一诗化自《月令》天子籍田劝耕的场景,后者正为全篇劝农躬耕的主题建立起经典依据。

陶渊明注重将《礼记》与《论语》合用,以表达其价值诉求与精神高境。一篇之中糅合二者的,如《有会而作》“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句,^{[1]180}化用《檀弓下》卫国公叔文子施粥赈灾与齐国黔敖救济饥荒的事典,反对不食嗟来之食者最终饿死的迂执行为。不过,他紧接着在下句申述“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兮余多师”之志,^{[1]180}化用《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表达馁不违道的心志。另外,诗句一联上下句分别出自二书的例子也较多。

如《咏贫士》其三“岂忘裘轻裘,苟得非所钦”句,^{[1]218}化自《论语·雍也》(公西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与《礼记·曲礼上》“临财毋苟得”等。上述均立足《礼记》《论语》的共通之处,以凸显对廉、节、孝、友等品质的崇奉。

另外,《周易》中的概念范畴、词语、意象、句式都不乏为陶集征用的例证,同时陶渊明也深受《周易》乐天知命、立象尽意等思想的影响。^[8]《周易·系辞》有关出处语默、知命不忧的论断多为陶渊明所征用,它们又多为《礼记》的相关论述相融合,呈现《易》《礼》融汇的思想样貌。如《命子》《与殷晋安别》《饮酒》其十八等作,就颇有《周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语或默”与《礼记·檀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合二为一的倾向。另外,《周易》惜时进取观也多为陶渊明所信奉,如《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读史述·屈贾》,均是《周易·乾卦》“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的体现。这种惜时观又与《论语·阳货》“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密切结合,如《劝农》《游斜川》《杂诗》其一、其二、其三、其五、其七、其九、其十、《咏三良》,均表达了勤勉不辍、及锋而试的思想,这也是陶渊明天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应该说,陶渊明将《礼记》《论语》《周易》的相关理义高度融合,而熔铸成为自身的天命观。其《与子俨等疏》以《论语·颜渊》子夏所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为深谙穷达寿夭的洞达之论,这也是他豁达面对生死认识的基础。如《归去来兮》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1]267}《自祭文》说“勤靡馀荣,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人生实难,死如之何?”^{[1]310-311}上述集中阐发了他乐天知命、超然生死认识,其思想根源立足《周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礼记·哀公问》“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以及《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换言之,安土乐仁,居易俟命正是陶渊明天命观的根本所在。

陶渊明践行其天命观的过程中,始终标举富贵浮云、安贫乐道的信念。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

治中》“吁嗟身后名，於我若浮烟”句，^{[1]74}即奉行《论语·述而》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句，^{[1]120}更是《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忧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诗化复述。《荣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句，^{[1]10}则依据《礼记·祭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曲礼上》“敦善行而不怠”，径以“道”“善”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他还不断以君子固穷的信条自励，其《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饮酒》其二“不赖固穷节”、十六“竟抱固穷节”、《有会而作》“斯滥岂悠志，固穷夙所归”、《咏贫士》其七“谁云固穷难”、《感士不遇赋》“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等句，^{[1]124,141,161,180,224,256}均源于《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则斯滥矣”。陶渊明崇尚避世之隐，《桃花源诗》“嬴氏乱天纪，贤者辟其世”句，^{[1]276}就由《论语·宪问》“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而来。不过，就其安于乡土而隐的表现来看，他似乎更倾向于“避地”之隐。其《答庞参军》说“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1]77}化用《礼记·儒行》“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与《檀弓上》“今丘也，东西南北人也”，表明甘于幽居一隅而非孔子颠沛四方的心态，这正是其安土乐仁的体现。另外，在日常生活中陶渊明不离琴、书，也是受《礼记·曲礼下》“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的影响。

总之，他的一生取资《论语》《礼记》《周易》，以君子儒的道德境界、行为准则作为自身天命观的理论基础和践行鉴镜。无怪乎朱熹说“晋宋间诗多闲淡，……陶云‘身有余劳，心有常闲。’乃《礼记》身劳心闲则为之也。”^{[9]3327}刘熙载也说“陶渊明大要出于《论语》。”^{[10]55}因此，陶渊明的居易天命观以糅合《易》《礼》《论》《礼》融通为根本特征，其诗文呈现旷达闲远之气也就油然内生、沛然外显了。

三、《诗经》《孟子》与陶渊明刚健人格观

陶渊明的刚健人格观主要由讽谏批判、独善自守、浩气自养与“大体”观组成，它们主要受《诗经》《孟子》的影响。陶渊明《闲情赋序》赞同蔡邕《静情赋》“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的创作原则，这也是其讽谏意识

的充分展示。其赋末宣称“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1]260}更说明其讽谏意识深深植根于《诗经》及《毛诗序》。《诗经》对陶渊明文法修辞尤其是四言诗的创作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袭用《诗经》原句，化用辞句、句式、句意，对《诗经》的美学风貌、意境加以继承和创新，等等。^{[11]299-303}吴崧《论陶》说：“渊明非隐逸流也。其忠君爱国，忧愁感愤，不能自己，间发于诗，而词句温厚和平，不激不随，深得《三百篇》遗意。”^{[12]186下a}可以说，陶渊明大量引《诗》、化《诗》，既吸纳其愍时悼世的讽谏传统，又深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原则。

陶渊明还深受《孟子》影响。陶渊明虽然仕途不显，却始终践行善念、善举。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结发念善事，黾勉六九年”、《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读〈山海经〉》其十一“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1]74,118,130,244}等等。上述均表明了他一生孤介守节、以善为念的心态。他还主张超越感官层面的“小体”感知而倚重心灵对天道的“大体”领悟，这正源于《孟子》。方宗诚《陶诗真诠》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即《孟子》从其‘小体’之意‘寓形宇内，能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即从其‘大体’之意。‘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即君子居易以俟命、无人而不自得之意。”^②《孟子·告子上》认为心有思考功能，为天所赐，是主要器官，即“大体”，善于利用“大体”者为“大人”；“耳目”不能思考，为次要器官，即“小体”，受“小体”遮蔽者为“小人”。陶渊明奉行得其“大体”的“大人”观，旨在忽略现实贫病而寻求心灵安适。他还崇尚《孟子·公孙丑上》“养气”说的道德境界，如《扇上画赞·于陵仲子》说“至矣于陵，养气浩然。蔑彼结驷，甘此灌园。”^{[1]296}《咏贫士》其四也说“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1]220}其立足《孟子·万章上》“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御马千驷，弗视也”，同样流露出非道、非义而不受禄的傲然士格。

陶渊明吸纳《诗经》《孟子》讽喻精神与健劲气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以《诗经》作为贫居栖隐的精神依据，蔑

弃富贵。《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也说：“《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明。”^{[1]217}可以说，《诗》《书》正是陶渊明辞仕安隐的重要支柱。他自觉维护《诗》《书》的思想价值，对于随时竞进、泯弃《诗》《书》者则大加挾伐，其《读史述·鲁二儒》说“德不百年，污我《诗》《书》。逝然不顾，被褐幽居。”^{[1]294}诗中表彰汉初二儒不应征辟的介特品质，同时对儒风沦替的颓敝世风加以抨击。虽然陶渊明也有仕隐纠葛与对富贵福祿的向往，如《杂诗》其九“遥遥从羈役，一心处两端”与《咏贫士》其五“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1]211,222}就展示了这种矛盾心态。不过，他始终信奉“君子固穷”的原则，不仅以曾子和子思“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1]191}自比，还径称“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1]180}其《咏贫士》其三说“赐也徒能辨，而不见吾心。”^{[1]218}又在《读史述·七十二弟子》中说“回也早卒，赐独长年。”^{[1]292}“赐”即子贡，西晋时子贡往往作为身名俱泰的典型而被推崇，陶渊明则以安贫养真作为唯一标准，暗讽子贡徒有长命之福，哀叹颜回有德而无寿。

其二，借用变风、变雅的讽喻手法，对时局进行暗讽、批判。史传称陶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13]2289}这说明他自觉以东晋遗民自居，对刘宋采取疏离自保的态度。清人邱嘉穗分析《九日闲居》说“前辈既以‘空视时运倾’句为指易代之事，则自‘尘爵’以下六句，实有安于义命、养晦待时之意，此则陶公自叹‘深情’者也。”^{[4]234下a}刘履、陈祚明、杨雍建、邱嘉穗、吴崧、许学夷等人均以《岁暮和张常侍》《拟古》及《述酒》“有悼国伤时之语”，^{[14]104}这些诗歌自然是其忠直品格的注脚。当然，陶渊明在借鉴《诗经》句式及笔法的同时，也注意加以变创。许学夷说“陶靖节四言，章法虽本《风》《雅》，而语自己出，初不欲范古求工耳。……靖节无一语盗袭，而性情溢出矣。”^{[14]98}正是其集中体现。

其三，信奉《孟子》宣扬顽廉懦立、守道履德的信条，崇尚“傲”、“猛”士格。陶集行文气脉明晰清切，命意深邃浩然，颇得《孟子》真髓。许学夷云：“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渊明，尤易晓

也。”^{[14]100}与之相应，陶诗中“慨”“壮”“贞”“猛”等字眼也频频出现，如《岁暮和张常侍》《杂诗》其九、其十、《拟古》其八、《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杂诗》其五、《读〈山海经〉》其十、《咏荆轲》等，均为其例。可以说，宗孟是陶渊明傲然品格的重要支柱。在晋末乱世的时代环境中，他对“立善”而无誉的普遍现实饱含愤慨。如《饮酒》其二“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即是其例。不过，诗末他仍然坚守“不赖固穷节，百世谁当传”的信念。^{[1]141}正因如此，萧统称赞说“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15]141下b-142上a}其以《孟子》顽廉懦立之典评价陶集，正是肯綮之谈。

综上所述，儒家经典对陶渊明的价值观念及文风构成主要产生四个层面的影响：

其一，融汇群经，别铸自我新知。陶渊明以《论语》《礼记》《周易》为核心形成其居易天命观，这是其生命哲学的根基。《孝经》《左传》是其仁孝观的主旨所在，他重视亲友伦理，轻代禄，重躬耕，与黎庶平等交往。《诗经》变风、变雅与《孟子》“独善其身”说、“养气”“大体”说，是陶渊明独善自守、咏古怀今的批判意识的根底。

其二，对儒家经典直接引用或化用，乃至与其他诸子的合用，展示了宽博的涉猎面和对儒典较为娴熟的运用技巧。陶集隶事往往不限于儒典中某一点为确切出处，被采用的语词或句式的上下文语境亦可能被借用，同时被采用的语词本身在儒典中往往也不止出现一次。陶渊明许多理解并不囿于儒典字面的意义，而赋予这些古老典故新的寓意。无论其仿写、取意，往往具有推陈出新、再铸伟辞的意涵。

其三，陶渊明以文章遣志怡情，同时儒家经典对其心志的规约作用也值得重视。他在展示躬耕田亩的切身经验的同时，还表达了对萧散清逸诗美的追求，并臻于登峰造极的境界。钟嵘《诗品》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风华清靡，岂直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16]260}这种评价其实涵盖了陶渊明融诗文心性化、人生诗意化的两方面，并为其诗文清雅质朴风格的形成作出了较为妥当的总结。陶渊明在充满诗意的生活方式下，对于儒学的宗奉贯彻到日常生活中，这无疑也促进了陶渊明诗文委运任化、儒道兼通等旨趣的形成。

其四,在晋宋之交玄风渐衰之际,陶渊明以清新质朴、开心见性的方式表达了对儒学价值观念的皈依和传扬,开启了南朝士人儒家进取价值观与闲适生活态度碰撞、融通的文学主题。与他基本处于同一阶段的颜延之、何承天、傅亮、谢灵运等人,尽管颇受玄、释家思想的浸润,但其创作的儒风特质却异常鲜明。像颜延之精通《论语》,开启了历代宗经为文、博学隶事的先河;何承天为当代名儒,曾参与“黑白之辩”,其《鼓吹铙歌十五首》旌表孝义忠顺,是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开山之作;傅亮精于朝仪之学,为当世之冠,亦承继傅咸《七经诗》以典缀篇的特点,文风雅重平衍;谢灵运自幼深受谢氏《诗经》、三

礼之学的规训,尽管倾心于释道之学,其文脉中也时常流露出儒素的口吻。可以说,陶渊明正是元嘉文坛儒化文风趋盛的先声。另外,白居易《代书》说“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以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刘)轲开卷慕孟轲为人,秉笔慕扬雄、司马迁为文,……异日必能跨符、杨而攀陶、谢。”^{[17]942-943}刘轲以孟子为思想宗主,以扬雄、司马迁为行文宗范,正是对陶渊明的直接承袭。由白居易所论,可知陶渊明、谢灵运是江州儒化文风的开启者和代表者,其影响远及唐代。这自然也揭示了陶渊明除了田园诗以及隐逸情怀外,以儒化文风对后世文坛产生影响的另一路径。

注释:

- ① 按,宋至清以来的笺注成果基本为上述三种著作所吸纳,故以之为统计依据。其中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为中华书局2003年4月版。下文出自陶集的注释,则均以杨勇《陶渊明集校笺》本为据。
- ② 方宗诚. 陶诗真诠[M]. 光绪四年《柏堂遗书》本,页8b-9a。

参考文献:

- [1] 陶潜撰,杨勇校笺. 陶渊明集校记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 陈 澧. 东塾读书卷一[M]. 杨志刚,点校.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3] 安 磐. 颐山诗话[M]//周维德. 全明诗话. 济南:齐鲁书社,2005:816-817.
- [4] 邱嘉穗. 山草堂陶诗笺卷三[M]//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243-253.
- [5] 惠 洪. 惠洪诗话卷三[M]//吴文治. 宋诗话全编第三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436-2439.
- [6] 沈德潜. 古诗源卷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7] 房玄龄,等. 晋书卷九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8] 李剑锋. 周易在东晋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J]. 周易研究,2003,(3):62-67.
- [9] 黎靖德. 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M]. 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0] 刘熙载. 刘熙载论艺六种[M]. 徐中玉,萧华荣,校点. 成都:巴蜀书社,1990.
- [11] 李剑锋. 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 [12] 吴瞻泰. 陶诗汇注卷三[M]//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186-199.
- [13] 沈 约. 宋书卷九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4] 许学夷. 诗源辨体卷六[M]. 杜维沫,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15] 萧 统. 梁昭明集[M]//张溥. 汉魏百三名家集第四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41-162.
- [16] [南朝·梁]钟嵘著,曹旭集注. 诗品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17] 白居易. 白居易集卷四十三[M]. 顾学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79.